

风范

红色家风·纪念建党百年

今年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30周年诞辰，曾孙陶侃深情回顾“求真、创造、为国、为民”的家风传承

行知传家久 精神继世长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陈姝

如果说一个人的名字与人生的理想追求息息相关，那么，对于陶行知来说，从改名的那一刻起，就决心自己要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奉献毕生的精力。

陶行知曾孙陶侃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曾祖父求学时，非常认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受此启发，在办学过程当中，他感悟到更多的事物应该是先行才能检验出相应的道理，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教育思想，即唯有实践才能逐渐获得真知，逐渐了解自然界的现象、性质、规律，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遂改名为陶行知。

“求真、创造、为国、为民”是家庭教育关键词

陶行知，原名文濬，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教育主张，他的一生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而奋斗。毛泽东主席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总理称赞他为“毫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称他为“万世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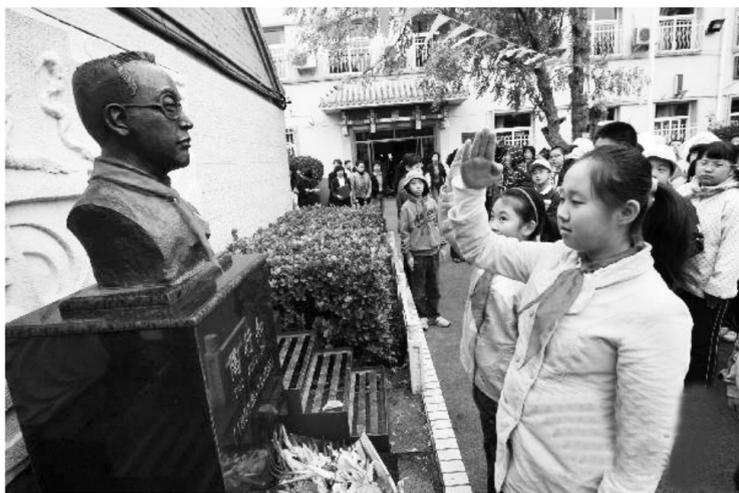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诞生在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其父陶位朝祖通文墨，为人厚道，陶行知童年随父读书识字。他的母亲曹翠仍勤劳、善良、朴实、忠厚、爽朗。陶行知的童年生活经历，为他后来在教育道路上，倡导教育救国与平民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14年，陶行知毕业于金陵大学，他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大学毕业后，陶行知去美国留学，拜于大教育家、哲学家杜威门下，研究现代教育。他立下了誓言：“我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家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个有效的公众教育体系……”回国后，陶行知放弃了高官厚禄，毅然投身于最广大的农村，并立下宏愿：筹募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曾祖父的一生是为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毕生心血实践了‘行知合一’的教育思想，践行了学以致用、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他高尚的人格富于魅力；丰富的思想饱含科学精神和前瞻性；他的创造和实践多元且卓越；他为人平凡且伟大，就像灯塔一样引领着我往前走。”陶侃说，曾祖父离开这个世界已经75年了，但是他的思想和精神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也是陶家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根基。

据陶侃介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陶



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的学生代表向坐落在校园内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塑像敬礼。 新华社发

宏、陶晓光、陶刚和陶城四位爷爷都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曾祖父在当年的11月29日、12月14日和12月21日写信给前线的儿子们：“现在做一个小孩子，要知道三件事。第一，做人的大道理要看得明白，即民族解放的大道理要彻底明白。第二，遇患难要帮助别人，要知道老百姓逃难的痛苦。肚子饿让人先吃；没饭吃时，要想法子找出饭来大家吃。第三，勇敢，勇敢地活才是美的活。勇敢的死才是美的死。”信中鼓励他们追求真理，学做真人，自立立人，自助助人，要把生命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

“曾祖父的信中透露了浓浓的父爱，‘求真、创造、为国、为民’的理念也一直是曾祖父的家庭教育关键词，虽然他来不及撰写家训、家规，但是，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曾祖父对晚辈关于真善美的教育。”陶侃说。

勤俭朴素的家风代代传

陶行知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做真人，把“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作为人生信念，在家庭教育中也是如此。

1940年，陶行知的次子陶晓光准备到成都一家无线电厂工作，厂方需要学历证明，陶晓光写信给上海育才学校副校长，希望能有个学历证明。陶行知知道此事后，写信告知：“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

“做人诚实守信，生活简朴，无形中成为陶家人的风范。”陶侃说，四个儿子始终遵循曾祖父的教导，这一优良传统一直流传下来。

据陶侃介绍，曾祖父去世后，二爷爷陶

晓光子承父业，毅然担任重庆育才学校代表和驻沪办事处主任，负责联系、筹款、迁校及捐校等工作。退休后，陶晓光又全力以赴研究和弘扬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推进全国陶研工作的开展及实践上做了不小的贡献。他抱病竭尽全力整理出版了《陶行知全集》。

“我祖父陶刚身体不太好，但从来不要特殊待遇，善良朴素，在那段艰苦的岁月，过着四处迁徙的生活，前后搬了近二十次家，也没有任何抱怨。近四十余年，默默无闻地把自己的心血精力都奉献给重庆育才学校和后来的上海市行知中学。”

陶侃回忆，为了帮助曾祖父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走出经济困境，祖父陶刚曾抱病徒步从桂林走到重庆，见到曾祖父时，两只脚都已经腐烂可见白骨，幸好曾祖父有一定的医学基础，及时送其到医院救治。祖父还没完全恢复，就第一时间下田开荒，种杂粮，缓解育才学校在经济上、粮食上面临的困难。

家风是无形的，润物细无声，融化在每个家庭成员的血脉中。

陶侃告诉记者，父亲陶育民参加工作后，拿到工资买了一件新的短袖衬衣。后来爷爷陶刚拿出曾祖父一张衣服比较破旧的照片，跟父亲说，曾祖父为了办学，只能穿一身破衣服会客，一生廉洁清贫。父亲听完祖父的话，把那件崭新的短袖衬衣挂在家里，像镜子一样警示教育后人，要勤俭持家。

“如今，尽管物质生活条件好了，但是我们从来不能铺张浪费，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陶侃笑道，每次吃完饭，碗里不能剩一个米粒，他也常常这样教育自己的女儿，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四代人接力教育事业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爱满天下，乐育英才”
……

句句珠玑，饱含陶行知对教育的思考与探索。

“曾祖父的至理名言太多了，但作为后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好汉。’”陶侃告诉记者，从这句话中他深深地悟出，只有提升自身素养，释放出自己的最大潜能，才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为更多的人谋幸福。

这句话也成为陶侃人生励志的语言，激励他一步步成长为优秀的人民教师。

2018年他主动到上海市宝山区罗店第二中学支教，班级的学生成绩参差不齐，他担任数学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他采用曾祖父的“小先生”“工作模式”“活术”等等，让每个学生轮流上台当15分钟老师讲课，这样轮流下来，激发了很多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令陶侃记忆犹新的是，一个学习落后生，成绩有了显著的提升。

“把成绩薄弱的学生教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我要做的就是能够给别人带去幸福。”陶侃说，正如曾祖父提倡的“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自己崇拜的学生。”

“我的祖父辈有两人做老师，其中我的爷爷陶刚原工作于上海市行知中学，小爷爷陶城原工作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父辈有四个人做老师，大姑陶铮原工作于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二姑陶海庆原工作于上海市行知中学、父亲陶育民工作于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小姑姑陶海萍工作于上海市行知纪念馆。到我这辈也就是第四代，除了我，还有表弟、表妹从事教育工作，四代人接力教育事业，传承行知的教育理念。”陶侃坦言，当年选择教师职业，更多源于家庭的熏陶和对曾祖父的崇敬。随着从教时间的延长，他深深地爱上了教师这个岗位，并把教育当成自己的一份崇高事业。

如今，陶侃从教已13年有余，牢记曾祖父“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谆谆教诲。他利用工作之余撰写《我的曾祖父陶行知》一书，将于今年6月出版。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民盟建盟80周年，也是我曾祖父陶行知先生130周年诞辰。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更要不断奋进。曾祖父遗志，在党的领导下现今都已经或正在逐步实现。曾祖父的理想和精神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我要努力弘扬曾祖父的思想与精神，学习更多育人培德的方法，将‘行知’的教育理念传送到更多的地方，让爱满天下。”陶侃的语气很坚定。

家风故事

家人的互相扶助才最珍贵

记全国五好家庭新疆沙雅县胡红英一家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王江平 邓丽娟

一家人互相担当，互相扶助最珍贵，是钱财买不来的。近日，新疆沙雅县塔里木乡其格格木村“全国五好家庭”获得者胡红英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今年51岁的张开春和42岁的胡红英结婚22年，在村里，胡红英孝老爱亲、张开春踏实肯干、乐于助人，孩子有家教、懂礼貌、好学上进被传为佳话。

“我上看他有担当”

1992年底，张开春从部队复员回家务农。为了摆脱贫困，他来到阿克苏市打工。经战友牵线，张开春认识了胡红英。胡红英的父亲在阿克苏做工程，从小她没有吃过钱的苦头，日子可谓顺风顺水。两人刚开始交往时，张开春告诉她自己家里条件不好，但看到张开春为了让亲人过得好一点，什么苦都能吃，有担当，胡红英认准了他。“他对我特别好，值得托付。”说起当初的选择胡红英记忆犹新。

结婚22年来，逢年过节、生日、纪念日……张开春的惊喜总会如期而至；首饰、衣服、护肤品……胡红英的礼物从未断过。两人把日子过得像恋爱时一样，在一个个微小的感动中，张开春让胡红英越来越踏实。

2001年，胡红英大儿子出生，因为变故一家人回到村里种地谋生。

2003年，张开春在乌恰县上寻得

商机，他决定种植大葱。当年，由于管理不当，附近棉田灌水时，他家地里的大葱全被淹了，投进去的钱全赔光了。

2004年，张开春借钱改种棉花，但第一年种棉花，钱又赔光了。

“我知道他是拼了命想给我和孩子好的生活。所以投资失败，我一点都不怪他，总是鼓励他。从头再来，一定能挣到钱。”胡红英理解并宽慰张开春。

“城里长大的她硬是陪着我折腾，从不因为我投资失败埋怨我，从未因两个家庭的经济悬殊看不起我。我想做的事，她都全力支持。拼命对她好，是必须的。”张开春说。为了让岳父母放心，也为了报答妻子的爱，张开春几乎一年到头在地里，他挣的每一分钱，都交到胡红英手中。

2013年，两人一起努力，终于把欠款全部还完了。

良好家风才是真财富

2008年，胡红英的公公因冠心病、肺结核住院。当时医生告知张开春，治好的可能微乎其微，宜尽早准备后事。

当时，胡红英小儿子1岁，为了照顾老人孩子，她全职在家。老人生病后脾气变得古怪，在村里基本上没朋友。有时候，张开春从地里回来，两句话说不好就要被骂一顿。胡红英总是劝他“让着爸爸，老小孩，老小孩，你想想你小时候乱发脾气，爸爸是怎么包容你的。”公公吃饭挑剔，胡红英不会做的饭

就从网上学。“不管在家里还是外面，我爸跟谁都说儿媳好。”张开春说。“我老公和大姑子、小姑子都很关心公公，我们孝敬老人，也是给孩子们做榜样，让他们从小懂得孝敬长辈。”胡红英说。

在胡红英的精心照顾下，公公的肺结核一年后彻底痊愈。从2008—2019年，胡红英数次接到公公的病危通知书，但她硬是让公公的生命延续了11年。2019年底，公公在家中去世，走得很安详。

2016年，婆婆出门摔了一跤，整个冬天，她为偏瘫的婆婆按摩、泡脚、推背、烤电，陪着针灸、康复。好不容易，婆婆能走了，2017年在家里又摔了一跤，这次彻底不能动了。

“那年夏天特别热，我每天要给她擦身好几次，隔一会儿要帮她翻身，垫的尿不湿湿了立刻换。护理、做饭，还要照顾公公，一整年全围着两位老人

转。丈夫在地里忙，有时候孩子的二姑来和我换个班。”胡红英说。胡红英说起婆婆生前对她像亲生女儿一般的疼爱和夸奖，胡红英数度哽咽。

“热爱祖国，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兄弟团结，友邻和睦，民族团结。”在胡红英家客厅的墙上，贴着一张她手写的家风家训，大儿子张晨阳和小儿子张鸿瑞从小就将对公公的规矩记在心里。如今，张晨阳已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大一学生，张鸿瑞也在昌吉读内初班。“从小就让他们凡事自己面对，孩子们也懂事，跟我们在地里一起干活，知道有知识的珍贵。”张开春说。

在学习上，两个孩子从来没有让胡红英操心，她心里暗暗为两个孩子的优秀感到骄傲。

“我和老公都是党员，希望孩子在学校也能入党，良好家风才是真财富，作为父母要做好表率。”胡红英说。



胡红英一家三代

革命先烈蔡以忱后人默默传承红色家风

生活再难，也不找组织麻烦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强洪 孙文静

“家风是种子，播撒在心灵深处，就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家风还是火炬，可以点亮心灵，照亮人生的征途。我们全家一直严格遵循祖父对党忠诚、低调做人、踏实干事的家训，绝不给组织找麻烦。”日前，59岁的武汉市黄陂区人大常委会干部蔡亚生向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讲述了他们这个普通家庭默默传承红色家风的感人故事。

蔡亚生的祖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蔡以忱。几十年来，蔡亚生和家人把光荣的家史当秘密，低调做人，踏实干事。

投身革命，教育家为百姓着想

革命先烈蔡以忱(1896—1928)是武汉黄陂人，明朝清官蔡完的后裔。1923年5月，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湘鄂两省的早期领导人和湖北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8月，蔡以忱任中共湖南省安源市委员会书记，参与制定秋收起义行动计划，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同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是秋收起义的核心人物之一。1928年7月，蔡以忱在湖南澧县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蔡亚生在儿时听家人和村里老人讲祖父蔡以忱的传奇，心中充满了敬佩之情。“祖父32岁就牺牲了，他投身革命后仅回过两次家。”蔡亚生说，蔡以忱有两个儿子，父亲蔡光海是蔡以忱次子。蔡光海刚满周岁就不得不寄养在乡下堂叔家。

蔡亚生回忆：“祖父在武汉从事革命工作时，祖母曾带着我大伯蔡惠安为他送信、做掩护，后来因工作需要，祖母带着大伯回到黄陂。”当时乡里很多人都跟蔡亚生的祖母吴金梅讲，“你家以忱当了这么大的官，为什么不找他要一些东西啊？”祖母说：“他离开时曾经嘱咐过我，自己有困难一定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不能找组织的麻烦。”自此，祖母回乡后始终没有离开故土，一直在黄陂家里种地，直到1970年去世。

传承好家风，再难也不向组织找麻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以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因当时国家干部的薪金以按级别定量供应粮食的方式发放，故对烈属的优抚，也是以供应粮食的方式抚恤。蔡家人谨记蔡以忱的嘱托，哪怕生活再困难，也没有一个人向组织提出特殊要求。

“祖母当年确实很困难，但她一直牢记丈夫的嘱托，困难时，她和孩子的生活全靠亲戚们接济、照顾，不给组织添麻烦。”

“20世纪60年代末，父亲蔡光海在武昌遵义中学(现三角路中学)教书时，母亲带着孩子在乡下种地，工分很低，家里年年缺粮。但父亲从来没有向领导和同事透露自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不愿意找政府的麻烦，让家人尽量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还说，国家这么大，有困难的人太多了，如果我们老是伸手向组织要这要那，会愧对父亲。”蔡亚生回忆。

蔡亚生参加工作后在蔡榨中学教书8年，后被抽调到区人大常委会，他努力工作，踏实做人，曾荣获武汉市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不论是从教的8年时间，还是在人大机关工作32年里，蔡亚生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始终传承着革命的优秀传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日过着朴素的生活。他的孩子也是这样，靠自己的努力、工作、生活。

2013年，武汉市纪委的同志为办展览找蔡亚生了解情况，才知道他是蔡以忱的孙子。“祖父蔡以忱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只有数件祖物是通过祖母作为‘传家宝’传下来的，这几件‘传家宝’被无偿捐赠给了博物馆。”

虽然蔡亚生小时对祖父的印象很模糊，但在成年后，他四处搜集和祖父有关的资料，并精心整理了资料册，他收集了《毛泽东的足迹》《董必武传记》《任弼时传记》等书的复印件，只要其中提到蔡以忱的部分，蔡亚生都用笔记下了。

“祖父远离故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蔡亚生对祖父的革命事迹越来越清晰，他说自己会不断搜集与祖父有关的资料和报道，把它们留给子孙。

不张扬家世，更不以先辈的名义向国家张口伸手捞名利、图享受。如今，蔡亚生把家训传授给自己的儿子：“我虽然是国家干部，但我不能也不会利用这些条件帮你，你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实干为国家作出贡献，把红色家风代代相传”